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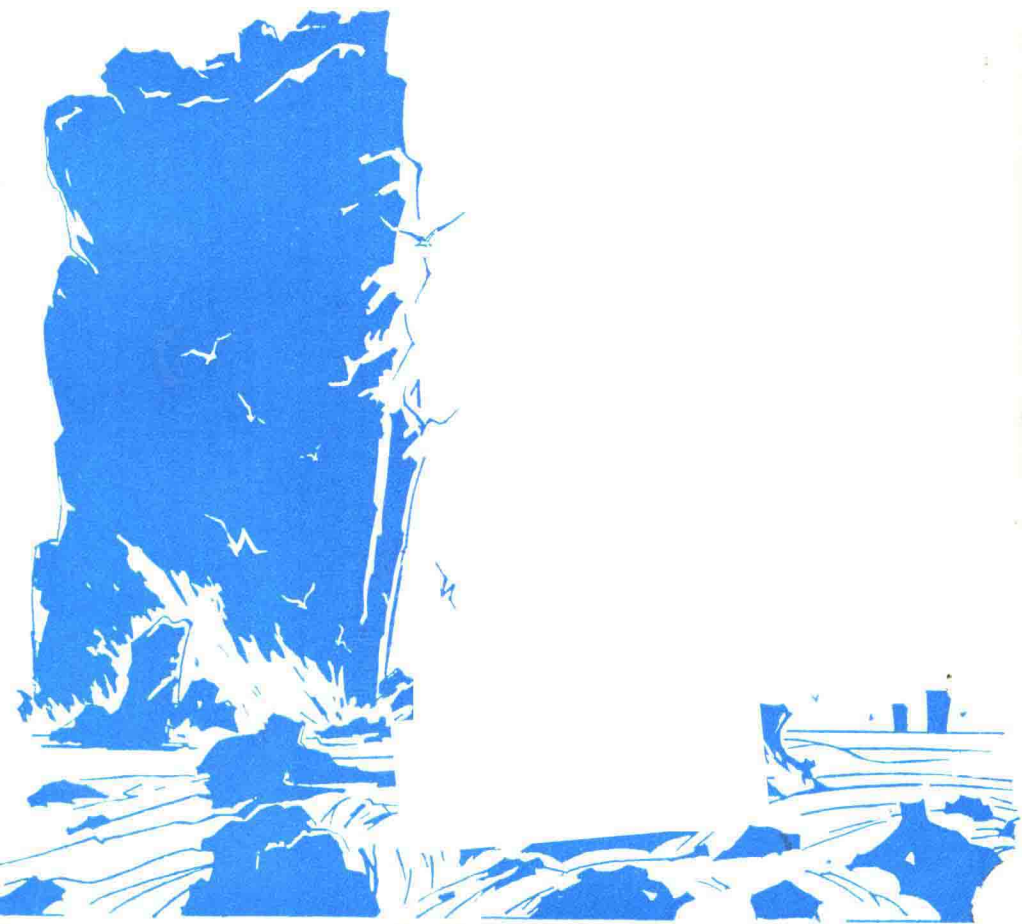
台湾小说选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TAI WAN XIAO SHUO XUAN JIANG

台湾小说选讲

陆士清等编



38197

台湾小说选讲(上)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416 千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1983 年 10 月第一版 198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6,500

书号: 10253·003 定价: 1.95 元

汉魂终不灭 林茂鸟知归

——序《台湾小说选讲》

陆 士 清

这本《台湾小说选讲》，是我们这几年开设的《台湾文学研究》这门课程的参考教材。共选了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四位作家、五十七篇小说。大体上说，自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有代表性的小说家大部分都有作品入选。虽然，透过这本《选讲》还不能看到六十多年来台湾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但是也能够约略地看到台湾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发展的梗概。所以《选讲》是初窥台湾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是深入了解台湾文学的一个梯次。

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仍然处在被切断的状态，时至今日，人们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尚很少了解，所以，当人们读着这些小说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提出问题：台湾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的？祖国的文化传统怎样涵盖和滋润着台湾文学的？台湾文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和有什么独特性？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的也是重要的问题，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回答，尚须假以时日。这里，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和初步的研究，就这些基本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本书的读者。

台湾是中国大陆母体的一部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相继登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自己的血汗浇灌着这美丽的宝岛。日本评论家村上知行说：“世界上没有所谓台湾人，假如有的话，那是住在深山里的番社的人吧（“番社的人”也是最早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笔者注），普通被称为台湾人的，实在完完全全是中国人。即使说多少有一点台湾的特色，或使人有这一种感觉，实际上仍然是纯粹的中国人。”^①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台湾，台湾的文化，是中国人民创造的，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1895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台湾被日本侵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得以光复。从1895年到1945年的五十年，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同胞疯狂镇压，肆意奴役和残酷掠夺的五十年，也是台湾同胞不甘屈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坚持中华民族传统，跟祖国人民一起寻求解放的五十年。而台湾的新文学，正是在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是既具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特点，又具有台湾乡土色彩的文学。

日本殖民主义者侵占台湾，其基本目的是要使台湾殖民地化，残酷榨取台湾以养肥本国。他们先是暴力控制，进而推行同化政策，特别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后，便全面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同胞在文化精神上放弃汉民族的固有传统，与祖国割断联系，妄图使台湾完

^① 张良泽：《吴浊流作品集·总序》

全“日本化”。日本殖民主义统治，遭到了台湾同胞的长期激烈的抵抗。

在日本占领初期，台湾同胞武装起义风起云涌，绵延不绝。1905年以后，在祖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台湾同胞展开了更加英勇的斗争，而且逐渐跟祖国的革命斗争发生了联系，成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的一部分。相继爆发的武装斗争有：1907年的北埔起义，1912年3月的林圯埔起义，1912年6月的土库起义。还有影响深远，震惊殖民统治当局的，1912年同盟会会员罗福星自大陆渡台组织的苗栗起义，1915年台南余清芳、江定、罗俊（罗俊也是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从大陆返台组织革命的）等领导的西来庵起义，也即是礁巴年事件。这些起义都给予日寇以打击，由于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都惨遭失败，成千上万的爱国同胞和革命志士壮烈牺牲。其中最为惨烈的是1912年罗星福起义与1915年礁巴年事件，前者牺牲二万人，后者达三万之多。但是，日寇的血腥镇压并没有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焰。面对失败，台湾同胞在思索，在总结，在寻找争取民族解放胜利的道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上出现了争取民族自决、民权平等的思潮，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照亮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在中国国内，随着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个强大的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揭开了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愚昧，批判封建礼教的大旗。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转折点的“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正在为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启示和鼓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以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做为争取自由，反

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①。这样，在1919年到1920年间，留学东京的一部分台湾进步知识分子，取跟祖国“同声相应”之意筹组“应声会”，后来组成了“新民会”，并仿照大陆的《新青年》创刊《台湾青年》，提倡民主自由思想。1921年，在台湾本岛的进步知识分子又把启蒙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组成了“台湾文化协会”。这个协会的真正目的是要摆脱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但考虑到倘若一开始就展开政治运动，恐怕会遭受殖民当局的压迫，所以先从文化着手，以启发民智，灌输民族意识，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立新道德、新观念，改革社会，来促使台湾同胞的政治觉醒。“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以后展开了积极而有成效的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文化协会的全盛时期，其影响深入各阶层”、“后来竟成为民族运动的大本营”^②，而作为文化启蒙一翼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应运崛起了。由此可见，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台湾同胞企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历史愿望在文化和文学上的表现。

二

如同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样，台湾新文学运动更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而且也是以白话文运动为其起始。1923年，黄呈聪的《论白话文的使命》、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两篇论文的发表，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接着黄朝琴主持了新创刊的《台湾民报》开辟的《接应室》专栏，主答白话文问题，并在台南组织了“白话文研究会。”同年，《台湾民报》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秀潮

① 钟肇政：《台湾地区文学的过去、现在、未来》。

② 参阅台湾史迹研究会汇编的《台湾丛谈》。

生(许乃昌)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第一次介绍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情况。1924年，张我军投身于新文学运动。他以“建设白话文学，改造台湾话”为主题，先后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旧殿堂》等文章，猛烈抨击旧文学。1925年，在与旧文学代表者的论战中，张我军又写了《揭破闷葫芦》、《诗体的解放》，为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作了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几乎是在张我军《诗体的解放》一文发表的同时，杨云萍、江梦笔创办了台湾第一本白话文学杂志《人人》。1925年，赖和首先突破了写白话作品的困难，抓住了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时代脉搏，进行新文学创作，接连创作了诗《觉悟的牺牲》、散文《无题》、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这些作品和杨云萍的小说《光临》、张我军的小说《买彩票》等，使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在创作上显示了实绩。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经过杨逵、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杨华、吴浊流等作家的努力，台湾新文学终于形成了居于现代台湾文坛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台湾早期的“乡土文学”。

台湾新文学运动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是由大陆和台湾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它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首先，发动这场新文学运动的人大多同大陆和五四运动有关系。他们大都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到过大陆，目睹蓬蓬勃勃的新文学运动，回台后提倡文学的改革的。第一个写文章提倡白话文的黄呈聪说过：“我今年六月到过中国的地方，看过白话文普及的状况，一般得着便利很大，更加感到确实有

普及的必要。”^①这说明，黄呈聪提倡白话文，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事实教育下发难的。为新文学破土而出大喊大叫过的张我军，1923年赴北师大学习，在写《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一哭》等文章时，正来往于北京与台湾之间，他在小说《买彩票》附记中注明，该附记写于1926年北京便是证明。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赖和，曾在1918年内渡厦门，在博爱医院服务，因受五四运动冲击，深感民族自决的重要，对启迪民智的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使文学不再是某一阶层的专利品，他于1919年返台，一边行医，一边投身新文学运动。台湾第一本白话文杂志《人人》的创办者之一杨云萍，在追述他所以投身新文学阵营时，也明确地说：“我则初受旧文学的影响，后来受五四的刺激”^②。

第二，台湾新文学运动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为其理论。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不仅从“五四”新文学提倡者那里得到启发，而且直接地大量地引用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不主义”以及有关的诗歌创作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同时，他们还介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一些代表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等等，作为自己创作的楷模。

第三，正由于上述原因，就使得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过程和文学精神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过程和文学精神上也完全吻合。在过程上：从文化启蒙而文学运动；从白话文的提倡到新文学的创作，从理论上的破旧立新到创作上的显示实绩。在文学精神上：反映现实的题材，写实的手法，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

^① 《台湾》四年一号，1923年1月1日。

^② 《北部新文学、新剧运动座谈会》，《台北文物》三期二卷。

的主题，而直接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行，寻求民族解放，更是台湾新文学的灵魂。所以，廖汉臣在《新旧文学之争》一文中说：“中国新文学运动始于文字的改革而终于文学的改革，台湾新文学运动亦步其后尘，由黄呈聪、黄朝琴提倡白话文於先，以张我军提倡诗学的改革於后，而逐渐发展的。”他甚至说：“提倡新文学运动……更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台湾版了。”当然，在日本殖民主义者侵占的年代里，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日本文学也被介绍到台湾来等复杂情况，台湾新文学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日本进步文学（包括其他民族的进步文学）的某些影响，但这并非主要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之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来自祖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恰如张我军所说“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主流发生了影响和变迁，则支流也自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三

由于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台湾同胞企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历史愿望的表现，和它受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所以台湾的新文学一开始就遵循着写实主义的路线，面向被黑暗笼罩的台湾现实，表现了强烈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封建剥削压迫的战斗精神。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赖和树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早在1925年，当台中州北斗郡二林庄蔗农为保障自身的正当权益而遭到日警镇压的时候，赖和即写下了《觉悟的牺牲》一诗，愤怒控诉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赞美蔗农敢于反抗和承受牺牲的精神。在1926年发表的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和以后的《不如意的过年》等作品中，赖和一方面对日本殖民统治者作更加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一方

面鼓舞台湾同胞跟殖民主义者作斗争。这些小说充分体现了赖和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同样贯注在杨云萍、虚谷和杨守愚等人的作品中。杨云萍的《光临》是对殖民主义者走狗的讽刺，《黄昏的蔗园》则是对受日警保护的制糖会社盘剥蔗民的罪行的揭露。1926年，在暗无天日的台湾，杨云萍就发出了摧肝裂胆的抗议：“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难道我们永远应该做牛做马吗！不，不，决不！看他们能够耀武扬威到什么时候啊！”跟赖和同是彰化人，深受赖和影响的杨守愚此时也登上文坛。他的小说《凶年不免于死亡》，描写了一幕由地主、警察、官府勾结一起压迫贫苦农民，至使贫苦农民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而《一群失业的人》则通过失业者的困顿生活的描写，喊出了人间的不平。

到了三十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一批新的作家登上了文坛，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台湾艺术研究会、台湾文艺联盟等文学团体相继成立，《台湾文学》、《福尔摩沙》、《台湾文艺》和由杨逵主编的《台湾新文学》等文学杂志陆续刊行，涌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新文学创作不仅继续沿着早期新文学的路线前进，高扬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而且显示了某些新的特点。这时期，赖和以《惹事》、《丰作》和《善讼人的故事》等作品继续喷射着抗议的烈火，阐扬着民族的正义。朱点人以《秋信》深掘蕴埋在台湾同胞心灵深处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一腔爱国之情。他还以《脱颖》来嘲讽见利忘义、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把当了日本人的女婿而自以为身价高贵的陈三贵直呼为“唔，犬养的……”。这时，相继发表的吴希圣的《豚》、张深切的《鸭母》、吕赫若的《牛车》等作品，则力求在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透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的黑暗，

含泪带血地诉说着贫民百姓所遭受的深重灾难。阿三一家所遭受的打击（《豚》），阿应所受的冤屈（《鸭母》），杨添丁与厄运所作的挣扎和惨败（《牛车》），都写得震人心魄，催人泪下。而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则通过镇公所一个低级职员升官幻想的破灭，来透视在异族统治下台湾社会人际关系的险恶，以及这个社会前途的暗淡。

台湾新文学，在其孕育的过程中，就关注着在封建伦理道德桎梏下的妇女的命运。1922年，《台湾民报》上发表的由追风所写的日文作品《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姊妹们》，就已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批判：“都是社会制度不好，都是专制家庭的罪……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为这个制度哭着，如今我都明白过来了，我要为这些人奋斗，勇敢地奋斗下去。”觉醒了的主人公桂花，喊出了台湾妇女的心声。以后，许多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妇女命运的问题。1935年，杨华发表的小说《薄命》，不仅仅写了“又是一个旧礼教的牺牲者”，而且是一个被贫穷所吞噬的牺牲者。聪明柔弱的爱娥，因为母亲早亡，家境贫穷，七岁就被卖去当童养媳。贫困生活的折磨，公婆的摧残，使她发了疯，死去了。“唉！爱娥一生的命运，有谁去怜惜呢？她的死，有谁知道这是谁害她的呢？”在结尾处，作品对黑暗的社会发出了责问。

这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又一位代表人物杨逵登上了文坛。1932年他创作了著名的小说《送报夫》。杨逵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而且渗透进了鲜明的阶级意识。《送报夫》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相当突出：“日本的劳力的人不会压迫台湾人。反对军阀糟蹋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把你底保证金抢去了以后再把你赶出来的那个畜牲一样的老

板。到台湾去的人大多是这种根性的人和这种畜牲们底走狗，但是，这种畜牲们，不仅是对于台湾人，对于我们本国底人也是一样的，日本不少的人也一样吃他们底苦头。”通过送报夫的这一觉悟，杨逵要唤起的，已经不仅仅是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而且要人们透过这种民族压迫去看到阶级压迫——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看到挣脱民族压迫和挣脱阶级压迫的一致性。在三十年代初期，杨逵有这样明确的意识，是难能可贵的。这时期具有相似意识的作品，还有孤峰的《流氓》、杨华的《一个劳动者的死》。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意识，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初期作品中所不曾有过的。这些作品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和杨华的《薄命》，在三十年代中期就流传祖国大陆，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配合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台湾禁止一切民族主义运动，推行“皇民化”政策，使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受到了挫折。这时，进步作家受到迫害，如杨逵多次被捕，他主编的《台湾新文学》被迫停刊。在这种恶劣的处境里，除非怀有透视未来理想社会的坚强信念，否则动摇和投降是免不了的。于是有些台湾作家有犬儒主义式的逃避，有些作家有奴颜婢膝的行为。1942年在东京举行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台湾作家中，甚至有人做了“感谢皇军”之类的发言，等等^①。

但是，并非所有台湾作家都屈服了。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因为迫于强权的威压，暂时沉默着，而不屈的爱国志士，仍在坚持斗争。这时，杨逵被迫归农，经营首阳农场，决意宁愿饿死也要抗敌到底。他写了《无医村》、《泥娃娃》等作品，或侧面抗议，或正面批判日本殖民主义者穷兵黩武的政策。《泥娃娃》的结尾，以象

^① 叶石涛：《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30页。

征的手法，预示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败亡的命运。与此同时，“傲骨凜然的独行侠”吴浊流，则在1943年至1945年间，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日本特高警察发现的风险，写作长篇小说《亚细亚孤儿》，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控诉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罪行，为日本侵略和台湾同胞受难的历史作证。在“孤儿”胡太明佯狂的觉醒中回荡着民族的浩然正气：“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贼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① 总之，即使在黑暗最浓重的四十年代初期，在台湾的新文学中，中华民族的意识并没有泯灭，反帝的战旗也并未倒下。由此可见，从二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新文学，真实地反映了这个阶段的台湾社会的现实和人民生活的面貌，表现出刚毅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民族精神与社会正义，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说过：“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民众抵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荼毒最深……台湾的先行代作家在‘不知残酷、横蛮为可耻的铁鞋’下，英勇地负起了写作抵抗文学的任务，直挑问题的核心。这种反对帝国主义，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的主题，使台湾日治时代的抵抗文学，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文学主流合而为一，具有中国的性格，这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十分宝贵的遗产和风格。”^② 陈映真这个论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是正确的。

四

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这种政治事态的变化，影

① 《吴浊流小说选》，广播出版社，1981年2月第一版，第366页。

② 陈映真：《孤儿的历史和历史的孤儿》。参阅《吴浊流作品集》第24页。

响了台湾文学发展的过程，使得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呈现出一派混乱驳杂的景象。由于国民党切断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禁止刊行和阅读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作品，孤立中的台湾文坛沉渣泛起，一些文化人的笔下，流出了“蓝色的悒郁”、“色情文艺”和“胡扯八道的洋幽默”。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所谓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梦呓般的口号，国民党当局积极组织御用文艺团体，培植“军中作家”，鼓吹反共的所谓“战斗文艺”。于是陈纪滢的《荻村传》、姜贵的《旋风》、王蓝的《蓝与黑》等反共作品相继出笼，而“军中作家三剑客”，即朱西宁、司马中原、段采华也陆续登台，奉命炮制反共小说。荒漠而腐朽气息浓重的台湾文坛，又注进了一脉“反共八股”。

这时，与低劣腐朽的所谓文学和“反共八股”有所不同的是“乡愁文学”。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上自军政机构的达官贵人，下至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大约百万多人流落到了台湾。尽管他们去台湾的原因不同，到台湾后的境况也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离开了故乡家园和亲人故旧……都失去了生活的根，成了流落他乡的异客。所以，在台湾耽得愈久，他们思乡的情绪就愈炽烈，以至于患了怀乡病。这时“乡愁文学”也就应运而生。乡愁这个主题，成了三十多年来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月是故乡明，思如长流水。在五十年代，台湾的一些文人墨客，尤其是几位从大陆去的女作家，如谢冰滢、张秀亚、潘琦君、华严等人，大多编织过怀乡的歌，抒写那不招自来，挥斥不去的愁绪，以抚慰陷于寂寞困厄中的自我和同类。林海音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个，她的《城南旧事》寄托着对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北

京的怀念。这部主要人物连贯的系列短篇小说集，以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北平为背景，透过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小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和农民的痛苦和不幸，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动荡的充满着斗争的时代。因为那些事情大多是作者童年经历过的，所以写来感情真挚，形象鲜明，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思乡者的饥渴，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五十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反攻大陆”神话的破产，反共的所谓“战斗文艺”也遭到唾弃，而某些“乡愁文学”或“回忆文学”，也因为有着逃避现实的倾向，而失去了魅力，台湾的现实要求文学有所转变。也许正是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吧，1956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发行了。在创刊号发表的《致读者》中，夏济安呼吁作者做“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写“说老实话”的文学。当然，在当时的台湾要面对现实，说老实话谈何容易。但是因为这种文学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意向，所以它还是起到了作用，催生了一些说老实话的作品。聂华苓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写的部分作品，正如她在《〈台湾轶事〉写在前面》中说的：“那些小说完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但是，即使如聂华苓的这些小说，所面对的也只是大陆流落到台湾的部分小知识分子、小职员的生活，而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台湾现实，实际上还没有碰到。《文学杂志》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扭转这时候的台湾文学中逃避现实的倾向。所以，在1959年3月，夏济安离台赴美的时候，他又在《文学杂志》上写了一篇《致读者》，坦诚地说：我对台湾目前的文坛“如有什么不满，那就是若干‘逃避现实’的倾向。”

在五十年代的台湾，“蓝色的悒郁”、反共的所谓“战斗文艺”、“乡愁文学”以及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形成潮流的现代主义诗歌，淹没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声音。

194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使台湾同胞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他们挣脱了日本殖民主义的锁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种转变，虽然是台湾爱国作家为之奋斗和热切期待的，但当这种转变一旦成了生活事实的时候，他们却一时不能适应了。他们受了日文教育，习惯于用日文写作，需要重新学习和磨练中文写作的能力；以往他们身陷孤岛，而今要面对正在激剧变化中的整个中国，一时也无法掌握社会生活的脉搏。所以这时候，除杨逵、吴浊流等少数作家外，其他作家都趋于沉默。1949年国民党当局又把杨逵投进了监狱。这段时间里，可资纪念的也只有杨逵的《春光关不住》、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陈大人》、《先生妈》、《波茨坦科长》等作品。而吴浊流当时写的作品，最初还是用日文发表的。台湾的乡土文学面临着一个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題。幸运的是，这时候钟理和从北平回到了故乡台湾，承接早期乡土文学的传统，默默地耕耘。

钟理和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四十年代，成熟于五十年代。从1946年他举家从北平迁居到故乡台湾开始到逝世的这些年间，在贫病交迫中辛勤笔耕，写了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中篇小说《雨》以及《贫贱夫妻》等短篇小说五十多篇。1960年8月4日在修改中篇小说《雨》这部稿子时，旧病复发咯血而死。他以生命殉了文学事业，“是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

钟理和迁居故乡后，一直居住在农村，家计由妻子耕作维系，有时自己也参加农事。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许多农民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和早先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一样，大多以台湾